

教育交流 与教育现代化

田正平 周谷平 徐小洲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教育交流 与教育现代化

田正平 周谷平 徐小洲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 / 田正平, 周谷平, 徐小洲主
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3

ISBN 7-308-04161-1

I . 教... I . ①田... ②周... ③徐... II . ①教育
—国际交流—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②教育事业—现代化
—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 G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1817 号

责任编辑 陈晓菲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500 千

版印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161-1/G · 848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Welcoming Address(代序) 倪明江(1)

特邀报告

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 田正平(5)

早期教育现代化的选择与失落:一个比较视角
..... 丁 钢(15)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公派留学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成效
..... 陈学飞(25)

战前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和中国教育界 阿部洋(37)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Academic Exchange:
Experi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 Ka-ho Mok(49)

Contents and Problems with New Curriculums in Korea
..... Gu Ja-oeck(82)

Educati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Role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y Green(89)

留学生与教育现代化

留学教育与中国近代大学的定型

- 以 1920 年前后三所国立大学改革为例 张亚群(131)
马君武的致用大学理念与德国大学思想 叶 隽(142)
留学日本与鲁迅改造国民性教育思想的文化定位 杨 晓(159)
关于清末留日学生回国后开拓历史教育的考察
..... 铃木正弘(174)
留洋学者与南雍学术 王运来(188)
清末民初的留美女学生 谢长法(202)
关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国留学生赴苏学习的
历史考察 李 涛(217)

教育交流与教育改革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Curriculum Reform:

-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Roy Cox(239)
论教育交流中的文化位移与回归 别敦荣 李静蓉(262)
关于《壬戌学制》三三制导入过程的研究 今井航(271)
试论民国时期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演变 王丽燕(283)
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的高等教育改革
——以全国教育会议的特色及意义为例 桥本学(296)
论 20 世纪上半叶粤港澳中文教育的交流与发展 王建军(308)
对东亚汉字文化圈中三字经类似读物发行的研究 片野英一(325)
新课改中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问题及启示 蔡宝来(333)
教育交流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以全民教育观念的传入及影响为个案 朱宗顺(347)

-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教育实践 王 荣(362)
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中外合作办学 黄建如(374)

东亚教育交流与比较

- 关于日中教会学校的比较教育史 佐藤尚子(387)
晚清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教育 周谷平(398)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留日教育 余子侠 孙广勇(415)
日本的朝鲜殖民地统治和学校教育 佐野通夫(446)
论近代中日社会教育关系 王 雷(456)
中日教育交流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 赵叶珠(472)
中日中小学教师培训制度比较研究 童富勇(482)

附录一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 总结发言 田正平(495)

附录二 尊重·理解·借鉴·发展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周谷平 孙秀玲(498)

附录三 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代表名单 (503)

Welcoming Address(代序)

Ni Mingjiang*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my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on the opening of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ducational Intercourse and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warmest welcome to all of you, distinguished participants coming from home and abroad.

It seems now that a society based on knowledge has been building up, whil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trends of the future. The discussion on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will not only give us a perspective on this theme, but also can help us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era. Dur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With strong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the seminar will undoubtedly benefit much on the accumulation of research knowledge, and will direct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reform.

Now please allow me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our university and Hangzhou City.

* 倪明江教授,浙江大学副校长。

Zhejiang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n 1897, and it is one of the oldest universities in China. Ever since its founding, it has been well known for its innovative spirit and academic excellence. It is now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university with the widest coverage of disciplines in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has set up a development goal for the 21st century, that is, to build itself into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t present, it has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more than 100 universities in 27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t also has close ties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n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of globaliz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needs to strengthen and further develop i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this reason, I am very happy to see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meetings and conferences like this being held on our campus.

Hangzhou is an ancient city, and it was capital of China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in historical times. Also, it is a famous tourist resort for its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natural beauty, known in China as “the paradise on the earth”. In recent years, like other parts of China, Hangzhou has been experiencing great and fast changes. I hope our guests from outside Hangzhou will be able to see and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ity, the city and its people.

Finally, I wish this conference a complete success, and wish you all the best during your stay here with us in Hangzhou.

Thank you!



特邀报告

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

田正平

摘要：教育交流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各民族、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本文通过回顾近代以来世界教育交流的若干基本史实，着重探讨教育交流中政治取向与教育价值取向、政府与民间、借鉴与创新的关系等问题，以期认识教育交流的基本特征及其规律。

关键词：教育交流；历史；现实

一、教育交流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复杂的社会活动，既要受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具体国情的制约；也要受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规定和制约。前者决定了教育的民族性和差异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教育总要体现出自己的民族特性，表现出发展水平的差异；后者决定了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教育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世界范围看，教育现代化大都采用两种形式：一是社会系统纵向的历史因素的积累和延续，导致教育现代性的持续增长，在这方面，英国可以说是典型。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政治革命、工业革命，每次大的社会变革都促进了传统教育的改造和教育现代性的增长。正是通过这种渐进式的积累，英国成为世界上教育现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这种通过历史因素的积累和延续而实现的现代化，丝毫不排斥对外来因素的吸收与

作者简介：田正平，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利用。事实上,正是由于接受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英国才较早地迈出了教育现代化的步伐并成为教育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另一种形式是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教育,通过横向的扩展与接纳、冲撞与融合,给原有的传统注入现代因素,诱发新旧之间的冲突、矛盾,进而实现融合、创新。日本、印度、中国等在19世纪后期先后启动的教育现代化,即属此种类型。所谓不同教育之间的扩展与接纳,既可以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平等的方式开展的正常交流;也包括通过诸如战争、殖民主义扩张、不平等条约保护等非正常途径进行的交流。日本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标榜“求新知于世界”,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教育。在大量聘请欧美专家和学者的同时,多次派遣留学生和政府官员到欧美各国留学和考察,广泛吸收教育新知。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日本学制系统几经变革,充满了外来影响与日本传统观念的矛盾、斗争和融合;但是,其分别接受法国、美国和德国学制影响的轨迹却清晰可辨。与西方各国积极开展教育交流,是日本教育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从一个教育交流中的“输入国”开始变成“输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外教育交流而言,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近一个世纪,是在非正常态势下进行的。殖民主义者的兵舰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反映资本主义文明的西方文化教育伴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纷至沓来,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与外来影响结下不解之缘。无数志士仁人,正是把教育上的“以强敌为师”作为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漂洋过海、不畏艰辛、忍辱负重、前仆后继,在吸收、借鉴、融合中艰难地推进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印度是另外一种情况。到1849年,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英国政府在印度强制推行《伍德教育文告》。这份由英国爵士查尔斯·伍德(Wood)牵头形成的《伍德教育文告》认为,英国政府有责任在印度发展现代教育,并具体地提出发展现代教育的规划。英国政府采纳了这份文告并把它作为政府在印度的教育政策强制推行。毫无疑问,《伍德教育文告》所要强加

给印度的是 19 世纪英国的教育理念和模式，这种“交流”也几乎使接受的一方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但是，实施的结果却对印度现代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至于有的学者将《伍德教育文告》说成是“印度教育史上的转折点”，更有人评论它是“印度教育的基石，它为印度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1]。

历史昭示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处于顺境抑或是处于逆境，都要勇于通过各种途径，接受和吸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教育经验。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讲，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说到底，靠的是它的人才，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则需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保障。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先进的教育理念、制度、内容和方法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二、政治取向与教育取向

教育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它也遵循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即总是从比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向相对而言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辐射、传播、扩散；而后者通过与前者的交流，吸收前者的经验与成就，得以发展和创新。这里的“先进”与“落后”，主要是指教育本身，包括教育理念、制度、内容和教育发展水平，等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应该说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但也绝不能把两者完全等同。众所周知，近代德国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经济发展也极为缓慢，然而，与政治上、经济上的落后形势相反，德国在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 世纪的德国，涌现出洪堡(F. von. K. W. Humboldt)、费希特(J. G. Fichte)、黑格尔(G. W. F. Hegel)、赫尔巴特(J. F. Herbart)、福禄贝尔(F. W. A. Froebel)、第斯多惠(F. A. W. Diesterweg)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教育家、思想家，德国对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所进行的改革及其卓有成效的结果，不仅对欧洲各国而且对大洋彼岸的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高等教育而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德国的大学已成为全世

界公认的科学研究中心。举世的学者不断到德国走访或留学；各国的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大学，力图仿效德国的大学。”^[2]据统计，在1814年以后的100年中，共有约1万名美国青年和学者到德国的大学学习或访问。仅柏林大学一校，前后接纳的美国留学生就超过5000人。与此同时，有大批的德国学者到美国大学任教，传播德国的教育思想和制度。美国学者沃尔兹在1936年出版的《德国对美国教育和文化的影响》一书中说：“今日美国学术所拥有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某些分支领域所拥有的主导地位，直接和间接归于许多在德国大学接受先进训练和吸取灵感的美国人。”^[3]但是，19世纪的德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很难说是一个先进国家。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的教育并非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但由于中、苏两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认同，苏联几乎成了我国开展对外教育交流的唯一对象，并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据统计，1950至1956年期间，我国向13个国家派出7075名留学生，其中留苏学生就有6570人之多。^[4]这一时期，我国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初步形成，700多名苏联专家在各个高校担负着教学和科研的指导工作，620门课程采用了近1400种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材。^[5]特别要指出的是，教育价值的判断与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严重混淆。凯洛夫之取代杜威成为中国教育界的“护法神”，与其说是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方面的分歧，毋宁说是由于各自被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必然结果。由此导致的后遗症是教育思想、教育理论领域自由探讨之风的被窒息和对国外教育现状的逐渐隔膜。

1957至1977年的20年，从世界范围看，是一个教育改革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使世界各国在震惊之余，进一步认识到国家的实力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人才的培养质量，而人才的培养质量又与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进有极大的关系。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开始了新一轮以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改进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运动。在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方面，新理念、新观点、新试验，伴随改革实践不断提出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用，要素主义教育流派，新行为主义教育流派，结构主义教育流派，分析教育哲学，终身教育思想，范例教学论，以及赞科夫、巴班斯基影响巨大的教学理论，等等。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实践与教育理论探索相互激荡、相互推动，不仅超越了国家、地区及民族的界限，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因素及意识形态的干扰。与此同时，我们却深闭固拒，关闭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大门，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应该说，政治取向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间的教育交流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但是，很难说它就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我们既有以“强敌为师”、价值取向单一的教训，也有以“朋友为师”、价值取向同样单一的教训；当然，更有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博采各国之长的宝贵经验。历史昭示我们，政治因素并不能成为判别一个国家教育经验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教育借鉴之间的关系，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广博而开放的民族心态吸收世界各国教育之长。

三、政府行为与民间活动

各国之间的教育交流，既是国家与国家间的政府行为，也包括广泛的民间交流，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没有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稳定而具有高度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的时候，民间的交流往往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声势浩大的以中、日教育交流为主旋律的近代中外教育交流第一次高潮的出现，虽然与当时清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但事实上由于此时的清政府已面临“残局”，因而交流活动的开展，更多的是由民间和地方促成的。像江苏教育会、直隶教育会、湖南教育会等社团组织在这方面就做了大量工作；而僻处西南一隅的四川，派出的留日学生人数遥居各省之冠，几占全国的十分之一，究其原因，与川督锡良个人的态度有极大的关系。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锡良不仅按照他自己的

方式——发展‘民族主义’——去抵御外国，他还仿照西方建立了他的‘文化主义’，以此使中国人保持信心。锡良中西结合最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教育政策上。”^[6]再如，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以中、美教育交流为主旋律的近代中外教育交流第二次高潮的形成，民间组织、社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像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黄炎培主持下的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郭秉文主持下的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还有像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科学社，等等。正是上述民间组织和学术机构，或单独、或联名邀请了包括杜威、孟禄、罗素在内的世界一流教育大家来中国访问讲学；这些社团组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出版书籍，发表文章，大造舆论，为中外教育交流推波助澜。众所周知，民国初年至20年代中期的北洋政府，不仅缺乏起码的政治权威，而且主政者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政权的稳定都谈不上，遑论在对外教育交流上的深思熟虑和强有力政策导向。从世界范围看，分别兴起于欧洲和美国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20世纪前半叶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仔细分析起来，无论是新教育运动，抑或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它们的兴起、发展以及在全世界产生影响，主要是由一批具有共同信念的教育家的鼓动倡导、奔走呼号而形成声势的。换言之，声势浩大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基本上不带官方色彩，不是由哪个国家或政府强制推行，而主要是通过民间的交流而向世界各地传播的。

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稳定而具有高度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之后，政府的决策对对外教育交流会产生重大的无可替代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它将决定对外教育交流的价值取向，对外交流的广度、深度，对外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对外教育交流成果的转化，等等。我们甚至可以说，越是高度集权的国家，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就越大。因为它既可以鼓励、扩大这种交流，也完全可以削弱以至扼杀这种交流。就此而言，历史的现实的，别国的我们的，已有太多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历史昭示我们，在开展对外教育交流的过程中，要努力发挥政府和民间的两个积极性。没有民间的广泛参与，没有民间的积极性、主动性，对外教育交流就很难形成大的气候；而没有政府的正

确导向，没有政府政策的支持与扶植，这种交流就很难持久，更难将交流所产生的积极成果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巩固下来、发展下去。

四、交流、借鉴与创新

教育交流是为了吸收和借鉴并进而创新，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开展教育交流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教育交流中的吸收、借鉴与创新，具体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而言，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外来先进教育经验与本国国情的关系。所谓本国的国情，既包括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也包括教育本身的发展水平和实际需要。从世界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考察，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不成功的教训。美国在独立前后，特别是在 19 世纪不同时期通过与欧洲各国的交流，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英国、法国、德国和欧洲各个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美国的具体需要不断发展、创新，遂使美国的教育从进入 20 世纪以来，几乎是在各个领域一路领先。以高等教育为例，在殖民地时期，先是仿照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于 17、18 世纪创办了哈佛与耶鲁，但在学校管理方面，又另辟新径，与英国大学的自治传统迥异，实行董事会制而加强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农工业生产迅速发展，急需各种实业人才，于是有了 1861 年《毛利法案》的通过。联邦政府向各州拨地举办农工学院，一大批农工学院的出现不仅解决了高级专业人才紧缺的急需，而且这批农工学院中涌现出诸如康奈尔、波尔杜、俄亥俄等一批著名高等学府，也带动一批综合大学设置农工专业（或学院），可以说，这是欧洲国家未曾有过的创举。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又诞生了以霍普金斯为代表的另一类新型大学。如前所述，这是受德国柏林大学的启示，重在研究与发明，促进学术的进步，而不只是传递知识和文化。在接受德国大学新理念、新制度的同时，哈佛大学又首创选科制，并逐步在美国大学全面实行。高等教育的健康、稳步、持续发展，为美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 17 世纪初第一批英国移民登上新大陆迄今，前后不过 400 年，美